

独立创业还是合伙创业：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与绩效

甘宇^{1a}, 李伟^{2*}, 陈昌盛^{1b}

(1.重庆工商大学 a.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 b.国际商学院, 重庆 400067; 2.长江师范学院 财经学院, 重庆 408100)

摘要: 返乡农民工的独立创业与合伙创业在创业绩效方面会不会存在明显差异呢? 基于西部地区脱贫县调研获得的 828 个样本数据, 运用 Probit 模型分析返乡农民工不同创业组织形式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 结果表明: 相对于合伙创业, 返乡农民工独立创业的创业绩效明显更好。通过加入可能的遗漏变量、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和安慰剂检验等方法, 估计结果依然保持稳健。进一步, 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和采用条件混合估计方法 (CMP) 进行估计后发现, 独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为了获得更好的创业绩效, 更倾向于选择低门槛的业态进行创业。

关键词: 返乡农民工; 创业组织形式; 创业绩效; 业态选择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3)05-0047-08

Independent entrepreneurship or partnership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ial options and performance of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

GAN Yu^{1a}, LI Wei^{2*}, CHEN Changsheng^{1b}

(1.a.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Upper Yangtze Economy; b.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2.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 China)

Abstract: Are there som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between independent entrepreneurship and partnership entrepreneurship of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828 sampl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unties out of poverty in western China,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entrepreneurial organizational forms on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and its mechanism of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 was analyzed by using Probi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the independent entrepreneurship of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 was obviously higher, compared with that of partnership entrepreneurship. The results of estimation remain the same even by adding possible missing variables, using predisposition score matching estimation and placebo tests. Furthermore, through building 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 and using the conditional mixed estimation method (CMP), the estimation shows that in order to obtain higher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 were more inclined to start a business with a low threshold.

Keywords: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ial organization form;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format selection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于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和提振国内经济大循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本质上看, 创业活动本身是基于机会进行价值开发, 进而获取资源并进行组合与

利用的过程^[1]。资源获取及使用能力不足是导致创业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2]。在返乡农民工创业过程中, 自身资源效用最大化, 需要匹配与其最适合的创业组织形式。有调查表明, 在返乡创业农民工所选择的创业组织形式中, 个体和合伙企业约占 93.7%, 其中 65.4% 为“个体户”^[3]。

虽然独立创业和合伙创业二者都是“创业”, 但在实质上有很大区别^[4,5]。合伙创业与独立创业无论在市场竞争方面还是在组织决策方面都不同, 有可能导致创业绩效存在差异。一方面, 在市场竞争方面, 独立创业的规模通常不大、层次相对较低,

收稿日期: 2023-06-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1BJY140); 重庆工商大学专项课题 (CTBUESD35)

作者简介: 甘宇 (1982—), 男, 广西横县人, 博士,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创业理论与实践。

*为通信作者。

创业者多选择门槛较低的业态作为开端^[6]。但这些趋向于完全竞争的业态通常竞争激烈、利润较薄^[7]。而合伙创业则由于合伙方相互间的支持,各方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能增强创业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从而获得更丰厚的利润^[8]。例如,合伙创业就有“融资”替代效应^[9],淡化创业融资困难的影响,增加创业和项目前期发展的资本积累,有利于创业过程的规模化和专业化^[10],同时能消解创业的压力和风险,延长创业活动的生命周期^[11,12]。唐跃军等基于资源获取的视角研究发现,独立创业者取得的创业绩效相对较低^[13]。另一方面,独立创业者集决策和执行于一身,能够快速且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从而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14];与之相对,合伙创业组成形式较为复杂,其决策行为通常需要多方协商一致后才能推进,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反应较慢,往往错失良机^[15]。据此,不同创业组织形式在资源构成、决策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是否因他们所选的创业组织形式不同而产生差异,亟须通过实证分析进行厘清。

从已有文献看来,不少文献分别针对合伙创业及独立创业的原因展开了分析,也对其潜在影响展开了丰富的讨论,但针对返乡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创业组织形式与其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文献较为缺乏,对其系统性讨论较少,对相关支持政策的精准实施提供学术支撑的力度明显存在不足。据此,本研究拟就返乡农民工创业组织形式对其创业绩效存在的影响及其作用过程进行分析,以期对现有文献进行有益补充。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创业组织形式的选择对农民创业的成功率和创业收益有着重要的影响^[16,17]。在创业行为中,资源无疑是重要的前提及保证,足够的创业资源不仅有助于增强创业者信心,而且可以实现创业水平的跃升^[18]。通常而言,自有资金是返乡农民工创业资金的最重要来源。但囿于创业初始财富水平,返乡农民工通常面临金融约束,加之创业初期其能力相对较弱,所以当落实到具体的创业组织形式选择上,他们可能倾向于选择合伙创业^[19]。此外,合伙创业能在单一创业社会关系网络基础上实现拓展,形成更大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更多支持^[20]。相对于独立创业而言,合伙创业不但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而且在创业过程中,能够依靠团队效应进行更为科学的组织决策^[21]。在合伙创业中,创业者之间

具有目标一致、兴趣一致、相互依赖等特点^[22],他们通过优势互补、抱团取暖,在互补协作的基础上充分、有效地发挥各自人力资本优势,实现自我效能的增加,使得创业层次与规模均获得提升,市场交易费用得到降低,市场竞争力获得增强,最终实现创业绩效的提升^[23]。但是,合伙创业一般为人资两合模式,其不仅依赖一定的财务资本投入,更依赖合伙人的人力资本^[24]。而人力资本的彰显是一个逐步证实的过程^[25],创业者的人力资本一般未经证实^[26]。在合伙创业者之间,可能会出现从众心态^[27],导致合伙成员盲从,致使创业决策极化,创业绩效下降^[28]。因此,合伙创业与创业绩效之间不一定呈现为普通的线性关系。结合农村地区创业的具体实践,以及返乡农民工这一群体与其他创业群体间所存在的资源禀赋差异,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₁: 返乡农民工独立创业的创业绩效显著高于合伙创业。

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具备创业能力和创业禀赋的个体不多,创业活动偏少,返乡农民工在农村地区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合作者,不得不选择独立创业。而受自身知识储备水平和资金的制约,独立创业的个体更可能选择自己较为熟悉、资金门槛和技术门槛比较低的业态进行创业。这些业态与返乡农民工自己的知识储备、务工经验更加匹配,并且更容易嵌入农村地区生活生产场景之中,往往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业态,因此创业相对容易成功^[29]。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₂: 独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明显倾向于选择低门槛的业态进行创业,而低门槛业态创业能显著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的提升,即业态选择在创业组织形式与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数据来源、变量及计量模型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22 年寒假期间在西部地区脱贫县开展的一项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调查。该调查的样本地区全部为国家级脱贫县,其中包括 23 个国家开展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地区^①,涵盖了西部地区的大部分集中连片脱贫地区,兼顾了地区间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发展水平差异,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虽然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规模已越来越大,但是在全部农户中的比重还比较低,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获取样本的成本将十分高昂,因此调查主要采用了方便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

非随机抽样方法。本次调查共计访谈了 1200 位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获得了 892 份有效问卷。在剔除无效数据后，获得 828 个有效样本。虽然样本单位不是通过随机抽样获得，但是本研究中样本的绝大部分特征与基于全国范围的随机抽样调查获得的数据吻合度较高。比如德国劳动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IZA) 提供的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RUMIC) 显示^[30]，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 44 岁，男性的比例为 61%，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初中。而本研究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平均年龄为 40 岁，男性的比例为 71%，平均受教育程度同样为初中。由此可以表明，本研究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外部有效性。

(二) 变量选取

创业绩效：创业绩效为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在当前的研究中，关于创业绩效的衡量方式有很多，如邹芳芳和黄洁^[31]以创业后的年均收入反映创业绩效，芮正云和史清华^[32]以生存绩效和成长绩效衡量创业绩效，李俊^[33]以资金总量、盈利状况、员工人数和生产经营场所的面积衡量创业绩效。本研究在充分考虑返乡农民工的理解能力的基础上，使用自评创业是否成功衡量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绩效。调查询问了“您认为您的创业算是成功的吗”，选项包括“成功了”“说不清”“失败了”3 项。基于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实际，本研究将回答“成功了”

赋值为 1，将其他选项赋值为 0。

创业组织形式：创业组织形式是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在我国境内，企业的组织形式一般有三种：公司、合伙、个人独资。但是在农村经济活动中，绝大部分返乡农民工创业仅介于独立创业和合伙创业两种形式。合伙一般分为经济合伙、技术合伙、市场合伙以及管理合伙，但他们大部分都没有细分。为了分析的方便，本研究不对合伙创业进行细分。同样，有一部分以入股或以合作社的方式参与创业，本研究将其合并到合伙创业之中。个人独资创业有创立简单、权力集中、决策迅速、适应能力强等优点，返乡农民工多以这种形式进行创业。本研究在对创业组织形式进行赋值时，对独立创业赋值为 1，将合伙创业赋值为 0。

控制变量：很多因素会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绩效存在潜在影响^[34]。结合乡村创业的特点，本研究在基准回归中控制了返乡创业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创业所在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其中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创业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是否村干部、个人的管理能力；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家庭抚养比；基础设施条件包括交通运输是否方便、生产用水是否方便、生产用电是否方便、上网是否方便、手机信号好不好等。各变量的取值情况及主要统计指标见表 1。

表 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变量含义及取值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创业绩效	创业成功为 1，否则为 0	0.403	0.491
创业组织形式	独立创业为 1，合伙创业为 0	0.705	0.456
年龄	实际年龄	40.087	8.539
性别	男性为 1，女性为 0	0.714	0.452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为 1，初中为 2，高中为 3，大专及以上为 4	2.356	0.928
婚姻状况	处于婚姻内为 1，其他为 0	0.847	0.361
村干部	担任村干部为 1，否则为 0	0.103	0.304
管理能力	取值为 1—5，数值越大表示能力越强	3.621	0.696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数量	4.035	1.167
家庭抚养比	家庭非劳动人口与劳动人口之比	0.542	0.456
交通运输便利程度	取值为 1—5，数值越大表示越方便	3.970	0.733
生产用水便利程度	取值为 1—5，数值越大表示越方便	4.098	0.684
生产用电便利程度	取值为 1—5，数值越大表示越方便	4.136	0.618
上网便利程度	取值为 1—5，数值越大表示越方便	4.007	0.778
手机信号的强弱	取值为 1—5，数值越大表示信号越好	3.965	0.760

(三) 计量模型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创业绩效属于取值为0、1的二分类变量,因此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probit(y_i = 1 | X) = \phi(\alpha + \beta x_i + p_i' \gamma + f_h' \delta + v_c' \eta + \varepsilon_i)$$

其中, y_i 表示第 i 个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1 表示创业成功,0 表示创业不成功。 $\phi(\cdot)$ 表示正态累积分布函数。 x_i 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第 i 个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组织形式, β 是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 p_i 、 f_h 、 v_c 分别表示返乡创业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创业所在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向量, γ 、 δ 、 η 是相应的系数向量, α 为常数项, ε_i 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本研究的全样本而言,返乡农民工创业成功的概率为 41.0%;但从独立创业与合伙创业两方面进行简单比较,成功的概率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独立创业成功的概率为 42.6.0%,而合伙创业成功的概率为 34.8%,独立创业成功的概率比合伙创业成功的概率高出 7.8 个百分点,对两者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的 t 检验的统计量为 2.089,对应的 p 值为 0.037。由此表明,创业的组织形式与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当然,独立创业是否获得更好的创业绩效还需要通过更严格的实证分析来证明。

(二)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2 是对 (1) 式进行估计的结果,表中列出的数值为各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模型 (1) 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创业组织形式的边际效应为 0.079,并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即独立创业可使返乡农民工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平均提高 7.9 个百分点。模型 (2) 到 (4) 逐次添加返乡创业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及基础设施变量。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创业组织形式的系数值有所增加,并且稳定在 0.10 左右。由此可以看出,返乡农民工独立创业的创业绩效显著高于合伙创业这一假设 H_1 得到了验证。

相对于合伙创业,独立创业更能提升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其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独立创业灵活性较好。创业活动所需要面对的外部环境变

化较快,独立创业能够及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进行决策,节省与合伙人的沟通成本,提高效率,较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并取得收益。第二,独立创业避免了内耗。由于个人认知水平、能力及性格等存在差异,合伙人之间对内部管理、外部市场以及利益分配等有着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不可避免形成分歧甚至产生矛盾,从而对创业活动的顺利开展存在威胁。相对而言,独立创业则避免了合伙成员之间的内耗。第三,独立创业者的责任心得到最大程度的强化。在合伙创业活动中,由于公司、组织共有,创业者自身的责任感自然会降低,同时对其他合伙人在公司、组织中的努力程度、贡献程度形成较高的期望值。而独立创业则不同,创业者对创业负全部责任,创业活动的成败完全取决于自身的努力与贡献程度。因此,创业者在独立创业过程中的责任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强化。

从控制变量来看,个人特征变量中的年龄和管理能力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具有显著影响,而家庭特征变量中的家庭规模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在基础设施变量中,只有手机信号在 10%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影响。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创业组织形式	0.079** (0.038)	0.104** (.040)	0.108*** (0.040)	0.110*** (0.041)
年龄		0.009*** (0.002)	0.009*** (0.003)	0.011*** (0.003)
性别		-0.037 (0.040)	-0.047 (0.040)	-0.041 (0.040)
受教育程度		0.026 (0.023)	0.026 (0.023)	0.029 (0.023)
婚姻状况		0.128** (0.055)	0.100* (0.057)	0.089 (0.058)
村干部		0.010 (0.059)	0.013 (0.060)	0.041 (0.061)
管理能力		0.237*** (0.028)	0.239*** (0.028)	0.231*** (0.028)
家庭规模			0.030* (0.016)	0.033** (0.016)
家庭抚养比			0.030 (0.041)	0.024 (0.041)
交通运输便利程度				-0.011 (0.032)
生产用水便利程度				-0.025 (0.037)
生产用电便利程度				0.055 (0.041)
上网便利程度				0.014 (0.034)
手机信号的强弱				0.061* (0.033)
wald	4.37	98.77	101.08	112.65
Pseudo R^2	0.0039	0.0970	0.1011	0.1118

注:1.表格中的数字为边际效应,括号中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2.***、**、*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三) 稳健性检验

1. Logit 模型估计

对于被解释变量为二分类变量的模型，既可以采用 Probit 模型估计，也可采用 Logit 模型估计。具体应该采用哪一种模型，主要依据在于回归模型的随机扰动项是服从正态分布还是 Logistic 分布。但由于随机扰动项分布未知，为了确保结果稳健性，本研究同时给出了 Logit 模型边际效应的估计结果(表 3)。表 3 的估计结果与表 2 基于 Pr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非常相似。显然，虽然改变了估计方法，独立创业依然显著提高了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

表 3 Logit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创业组织形式	0.079** (0.038)	0.109*** (0.041)	0.113*** (0.042)	0.114*** (0.042)
个体特征变量	否	是	是	是
家庭特征变量	否	否	是	是
基础设施变量	否	否	否	是
wald	4.33	90.48	92.32	102.06
Pseudo R ²	0.0039	0.0972	0.1013	0.1122

2. 加入可能的遗漏变量

虽然本研究在基准回归中已尽可能地控制了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的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及创业地的基础设施变量，但由于影响创业绩效的因素比较复杂，因遗漏变量而导致的估计偏差仍然存在。因此，需要进一步排除其他因素对农民工创业绩效的潜在影响。结合已有文献，丰富的社会资本可以帮助创业者获取更多资金、技术和信息等资源，进而促进创业成长^[35,36]；政府支持可以部分弥补因制度缺失或不完善对创业企业的不利影响，并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有价值的资源，从而提高创业绩效^[37]；信贷约束也是影响企业创业绩效的重要因素^[38]。本研究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依次加入了社会资本变量、政府支持变量和信贷约束变量^②，估计结果见表 4。通过回归结果发现，在加入

表 4 加入可能的遗漏变量后的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创业组织形式	0.136*** (0.041)	0.134*** (0.041)	0.125*** (0.041)
个体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家庭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基础设施变量	是	是	是
社会资本变量	是	是	是
政府支持变量	否	是	是
信贷约束变量	否	否	是
wald	130.74	130.95	138.76
Pseudo R ²	0.1308	0.1319	0.1478

社会资本变量、政府支持变量和信贷约束变量后，创业组织形式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的边际效应有所增加。

3.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

基于反事实的因果分析框架，独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与合伙创业的返乡农民工应非常相似，其在创业绩效上的差异才能用创业组织形式的不同来解释。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合伙创业的返乡农民工中找到与独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相似的个体，并删除未匹配上的样本观察值，然后再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 5 是进行 1:4 近邻匹配的估计结果。从表 5 可以看到，4 种近邻匹配的估计结果均表明，独立创业均显著提升了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

表 5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创业组织形式	0.108** (0.042)	0.135** (0.043)	0.139*** (0.044)	0.134*** (0.043)
个体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家庭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基础设施变量	是	是	是	是
社会资本变量	否	是	是	是
政府支持变量	否	否	是	是
信贷约束变量	否	否	否	是
wald	106.08	119.35	112.72	123.83
Pseudo R ²	0.1234	0.1443	0.1466	0.1587

4. 安慰剂检验

样本的随机性可能会带来虚假的因果关系。为了排除这种虚假的因果关系的可能性，本研究对样本观测值进行随机排序，并假设位于前 70% 的样本观测值从事独立创业活动，位于后 30% 的样本观测值从事合伙创业，然后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 6。从表 6 可以看出，随机分配后的估计结果表明创业组织形式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绩效没有显著影响。本研究通过在 Stata 软件中设定不同的随机种子值，对上述过程重复 10 遍，其结果均表明这种随机分配的创业组织形式并没有对创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本研究之前得出的独立创业能显著提高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的结论并不是“纯属巧合”的结果。

表6 安慰剂检验

变量	(1)	(2)	(3)	(4)
创业组织形式	-0.051 (0.039)	-0.056 (0.039)	-0.053 (0.039)	-0.062 (0.040)
个体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家庭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基础设施变量	是	是	是	是
社会资本变量	否	是	是	是
政府支持变量	否	否	是	是
信贷约束变量	否	否	否	是
wald	111.08	125.96	126.85	144.40
Pseudo R ²	0.1069	0.1230	0.1243	0.1490

五、扩展讨论：独立创业影响创业绩效的路径

独立创业决策更加灵活，更加迅捷，可以更快适应市场需求，这可能是独立创业能够实现更高绩效的原因。现有文献从决策的科学性、知识分享、风险承担等^[13,39,40]视角对独立创业与合伙创业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详细分析。为更好地对现有文献进行有益补充，本研究不打算从上述视角展开讨论，而是选择从业态选择的角度来讨论独立创业影响农民工创业绩效的过程。在乡村创业实践中，“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4个行业^③的资金门槛和技术门槛相对较低，与农民工的知识储备、务工经验更加匹配，并且更容易嵌入农村地区的创业环境，创业成功的概率更高。本研究据此将“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定义为低门槛的业态，将其他业态定义为高门槛的业态，并设置创业业态虚拟变量，如果农民工选择低门槛的业态创业，则将

创业业态赋值为1，如果农民工选择高门槛的业态创业，则将创业业态赋值为0。用创业组织形式对创业业态进行回归，其结果见表7列(1)。从列(1)可以看出，独立创业的农民工倾向于选择低门槛的业态进行创业。

创业组织形式与创业业态之间有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即创业组织形式对创业业态的选择产生影响，而创业业态的选择反过来也对创业的组织形式存在影响，意味着表7列(1)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误。为了处理这种互为因果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将创业业态和创业组织形式作为内生变量，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并进行估计。为了解决联立方程的可识别问题，在创业组织形式作为被解释变量时，解释变量中剔除了基础设施变量，加入了创业者的交际能力变量。表7列(2)和(3)是用三阶段最小二乘(3SLS)进行估计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创业组织形式显著影响创业业态的选择，而创业业态的选择对创业组织形式的影响不显著。由于创业组织形式和创业业态均为二分类的离散变量，为进行有效检验，本研究进一步采用了由Roodman^[41]提出的条件混合估计方法(CMP)进行估计^④，其估计结果见表7列(4)和(5)。CMP的估计结果与3SLS的估计结果非常相似，即创业组织形式显著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业态选择，而业态选择并没有显著影响创业组织形式。综上所述，独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选择低门槛业态的概率明显更高，假设H₂获得了部分验证。表7列(6)是以创业绩效为被解释变量，以创业业态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返乡农民工选择低门槛的业态进行创业能显著提高其创业绩效。

表7 独立创业影响创业绩效的路径分析

变量	(1) 创业行业	(2) 创业行业	(3) 创业组织形式	(4) 创业行业	(5) 创业组织形式	(6) 创业绩效
创业组织形式	0.536*** (0.110)	0.667* (0.347)		0.667** (0.260)		
创业行业			0.250 (0.270)		0.231 (0.300)	0.138* (0.078)
个体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基础设施变量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社会资本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政府支持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信贷约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交际能力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N	750	750	750	750	750	750

综合表7的估计结果可知,独立创业的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对技术和资金要求不高的低门槛的行业开展创业活动。这些行业与返乡农民工的知识能力更加匹配,并且与农村的创业环境、资源优势更加契合,因此他们创业成功的概率更高。据此,业态选择在创业组织形式与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假设H₂得到了完全验证。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合伙创业,独立创业显著提高了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通过加入可能的遗漏变量、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和安慰剂检验等方法,估计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依据返乡农民工自身禀赋及农村地区的创业特点,将“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界定为低门槛行业,其他行业定义为高门槛行业,用创业组织形式对创业业态进行回归,发现独立创业的农民工倾向于选择低门槛的业态进行创业。为避免内生性问题对分析结论的冲击,进一步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并采用了条件混合估计方法(CMP)分别进行检验后发现,独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为了获得更高的创业绩效,倾向于选择低门槛的业态进行创业。

针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组织形式选择及其对创业成功率影响的实际,本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多举措保障返乡农民工独立创业的稳定发展。相较于合伙创业,独立创业者大多在资金和市场信息方面存在较大的短板和劣势。因此,一方面需要以制度安排的形式加大创业贷款担保基金建设力度,提高小额担保贷款额度,支持有技术、有市场、信用优、经营业绩好的独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二次贷款;在返乡创业较为集中、产业特色突出的区县,开展股权众筹融资试点,缓解独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资金不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消除独立创业成功的返乡农民工有序扩大生产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需要地方政府结合本地产业发展实际,不断创造独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与同行交流学习的机会,利用基层创业服务平台增进市场信息的精准供给,提升独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的行业认知水平,增强他们对市场需求的洞察力,使其对市场变化的预判能力不断提高,消解独立创业信息来源单一的弊端,缓解信息不对称对独立创业有序发展形成的潜在约束。

第二,引导合伙创业的返乡农民工做好制度建设,加强合伙关系的管理,提升合伙创业的经营效率。要完善合伙创业的经营规则,拟定详细的管理制度条例,订立规范的书面合伙协议,按规则和制度经营,避免以感情替代规则;明确出资、收益、债务和风险共担共享,账目记录清晰,利益分配明确;优化创业过程中的决策程序,对责任、权力、利益进行明确划分,使合伙企业内资源各得其所、各尽所长,避免产生责任推诿以及一事多管的现象,最终提升合伙创业的经营效益。

第三,支持鼓励低门槛创业者循序渐进提档升级。鼓励在低门槛业态已经创业成功的返乡农民工,学习借鉴城市中现代工商产业的产业组织形式、经营管理方式,重视自身品牌理念的提升,顺应家乡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升级的市场需求,逐步把小门面、小作坊升级为特色店、连锁店、品牌店。同时发挥其既熟悉外地市场又熟悉家乡资源的优势,充分挖掘乡村、乡土、乡韵的潜在价值,借力“互联网+”信息技术推进低门槛创业业态的转型升级,渐进实现本地产品与外地市场对接。

注释:

- ① 被调查区域涉及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新疆、陕西、广西等1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根据预调查中所反馈的信息,西藏返乡农民工创业数量较少,故未将其纳入正式调查范围。
- ② 本研究用创业者是否有亲戚从政或经商来衡量社会资本变量,用创业者对政府的创业支持政策的满意度衡量政府支持变量,用创业者从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衡量信贷约束变量。
- ③ 我们在问卷中询问了具体的创业行业,包括:a.农、林、牧、渔业;b.采矿业;c.制造业;d.建筑业;e.批发和零售业;f.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g.住宿和餐饮业;h.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租赁和商务服务业;j.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k.文化、体育和娱乐业;l.其他。
- ④ 该方法基于极大似然估计法,以似不相关回归为基础,通过构建递归方程组而实现多阶段回归模型的估计。

参考文献:

- [1] 厉杰,孙瑞杰. 社会企业创立过程影响因素探究[J]. 科学学研究, 2020(9): 1647-1653.
- [2] 袁彦鹏,鞠芳辉,刘艳彬. 二元价值平衡与社会企业创业策略——基于创业者身份视角的多案例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20(3): 36-49.
- [3] YU L H, TANG X P, HUANG X H. Does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promote entrepreneurship?—Evidence from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3(6): 101977.

- [4] 曲兆鹏, 郭四维. 户籍与创业: 城乡居民自我雇佣的差异研究——来自 CGSS2008 的证据[J]. 中国经济问题, 2017(6): 72-86.
- [5] 霍生平, 谭敏. “直播带货+小农户”联合创业团队断裂带、创业拼凑与创业绩效研究[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1): 37-43.
- [6] 彭伟, 于小进, 郑庆龄. 中国情境下的社会创业过程研究[J]. 管理学报, 2019(2): 229-237.
- [7] 朱仁宏, 周琦, 伍兆祥. 创业团队契约治理真能促进新创企业绩效吗——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 南开管理评论, 2018(5): 30-40.
- [8] 张默, 任声策. 创业者如何从事件中塑造创业能力?——基于事件系统理论连续创业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18(11): 134-149.
- [9] 吴静, 周嘉南. “中国合伙人”为何“分手”: 创业团队冲突演化路径分析[J]. 管理评论, 2020(10): 181-193.
- [10] 王冰, 毛基业. 传统企业的内部创业组织如何获取正当性[J]. 管理评论, 2020(4): 104-116.
- [11] 闫华飞, 肖静. 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现状与模式探索——基于湖北省调研数据[J]. 江苏农业科学, 2020(15): 1-8.
- [12] ARIF R, CHAUDHRY T T.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emigration on labor market activity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in Punjab, Pakistan[J].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2023(4): 100547.
- [13] 唐跃军, 左晶晶. 创业企业治理模式——基于动态股权治理平台的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20(6): 136-147.
- [14] 魏凤, 闫芑燕. 西部返乡农民工创业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西部五省 998 个返乡农民工创业者为例[J]. 农业技术经济, 2012(9): 66-74.
- [15] 丁俊华, 耿明斋.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执行绩效与治理逻辑——基于全国 23 个省(区、市)问卷调查的实证检验[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2): 78-83.
- [16] 王艳玲, 张广胜. 农户电商创业意愿实证研究——基于技术接受、感知风险与主观经验[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2): 90-100.
- [17] 胡望斌, 张亚会, 焦康乐. 认知视角下公司创业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J]. 管理学报, 2022(4): 611-623.
- [18] 张银普, 钱思, 胡平. 基于角色清晰与团队认同的创业团队断裂带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 2020(4): 562-571.
- [19] SHAH S K, AGARWAL R. Jewels in the crown: Exploring the motivations and team building processes of employee entrepreneurs[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9(9): 1417-1452.
- [20] 田莉, 张劭浩, 袁国真. 创业团队身份异质性对团队冲突过程与结果的影响——基于团队断裂带的多案例研究[J]. 管理评论, 2021(12): 324-338.
- [21] 熊立, 年鹏翔. 创业者社会网络、团队二元即兴与市场响应绩效研究[J]. 管理学报, 2022(11): 1637-1647.
- [22] 任兵, 刘爽, 单宇. 创业退出过程中的制度不确定性、创业者认知与创业团队组态——一个纵向单案例追踪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23(1): 94-107.
- [23] 朱满德, 赵琴, 程国强. 关系网络、企业家精神与新农人创业[J]. 农业经济问题, 2023(5): 1-13.
- [24] 朱仁宏, 周琦, 张书军. 创业团队关系治理与新创企业绩效倒 U 型关系及敌对环境的调节作用[J]. 南开管理评论, 2020(5): 202-212.
- [25] DESANTOLA A, GULATI R. Scaling: Organizing and growth in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7, 11(2): 640-668.
- [26] YANG X L, HONG X Y, LI W C. “Only childre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Spillover effects and mechanisms[J].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23, 79: 101994.
- [27] 许楠, 田涵艺, 刘浩. 创业团队的内部治理: 协作需求、薪酬差距与团队稳定性[J]. 管理世界, 2021(4): 216-230.
- [28] LAZAR M, MIRON-SPEKTOR E, AGARWAL R, et al. Entrepreneurial team formation [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20(1): 29-59.
- [29] 甘宇, 李伟. 见贤思齐: 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提升的一个解释[J]. 农业技术经济, 2023(6): 99-114.
- [30] 许明. 外出务工经历与返乡农民工创业成功率——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反事实估计[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0(4): 70-79.
- [31] 邹芳芳, 黄洁. 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创业资源对创业绩效的影响[J]. 农业技术经济, 2014(4): 80-88.
- [32] 芮正云, 史清华. 中国农民工创业绩效提升机制: 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基于“能力-资源-认知”综合范式观[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4): 108-120.
- [33] 李俊.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城市创业绩效研究——基于东部 13 城市数据的分析[J]. 兰州学刊, 2018(3): 173-184.
- [34] 赵德昭. 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J]. 经济学家, 2016(7): 84-91.
- [35] 郭铖, 何安华. 社会资本、创业环境与农民涉农创业绩效[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7(2): 76-85.
- [36] 冯文娜, 姜梦娜, 孙梦婷. 市场响应、资源拼凑与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绩效[J]. 南开管理评论, 2020, 23(4): 84-95.
- [37] 李颖, 赵文红, 周密. 政府支持、创业导向对创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 2018(6): 847-855.
- [38] 李长生, 黄季焜. 信贷约束和新生代农民工创业[J]. 农业技术经济, 2020(1): 4-16.
- [39] 刘忠艳. ISM 框架下女性创业绩效影响因素分析——一个创业失败的案例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17(2): 272-281.
- [40] 施贞怀, 沈瑶. 土地供给、创业成本与创业活动[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1(4): 144-156+160.
- [41] ROODMAN D. Fitting fully observed recursive mixed-process models with cmp[J]. *The Stata Journal: Promoting Communications on Statistics and Stata*, 2011(2): 159-206.

责任编辑: 李东辉